

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或经验：他者性视角的制度条件

摘要

“法律的生命在于逻辑还是在于经验”这一经典追问，预设了一个需被重新审视的前提：法律的生命力存在于它自身的运转方式之内。本文提出一种替代性判断：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或经验的二选一，而在于它能否在效率逻辑与传统法理自我描述互相加固的压力下，持续维持一种“他者性视角”——一种在其他所有视角都主张自身合法性时，坚持看到不被任何法律分类框架所代表的、处在规范体系缝隙里的真实冲突的能力。本文通过判决制度的功能结构解剖、判决书文本演化分析、裁决者职业主体性诊断与代际传承机制考察，揭示了效率治理逻辑如何系统性地压薄了司法系统赖以“感知他者”的制度条件，并将合法性话语从实质说服转换为程序形式。在此诊断基础上，本文给出了一套可操作的制度干预方案——包括法学院感知习惯重建、类案系统边界区分栏位强制植入、入额考核判决书写作门槛设置——并为“他者性视角作为法律生命力独立变量”这一核心命题设计了可裁决的经验检验框架。本文的根部理论贡献在于改写传统法理学关于“法律是什么”的预设：法律的核心职能不是在规范体系内部完成逻辑闭合，而是在每一个具体纠纷中维持一种超越同一性闭合的感知能力——去听到那些不被现有分类格所容纳的声音。感知能力的制度维持，才是法律生命力的真正根基。

1 引言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霍姆斯大法官在一百多年前写下这个判断时，他的靶子是法律形式主义那种把法律当作封闭逻辑体系的自我想象。他的意思是，法律不是从公理推导出来的定理系统，而是在具体纠纷中、通过裁判者的经验判断逐步形成的一套解决冲突的实践技艺。这个论断在普通法传统中有着根基性的影响，也在大陆法系引发了持续的争论：法律到底是规范的科学适用，还是裁决者经验智慧的运用？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个问题在中国司法系统的当代实践中，正以另一种形态重新浮现。近二十年来，中国法院系统经历了以“质效考核”为核心的效率治理转型——从收结案比、审限内结案率、改判发回重审率到调解率，一套日益精细化的指标考核体系重塑了裁决者的日常工作节奏与职业行为策略（苏力，2004；陈瑞华，2018）。这场转型的显性目标是正当的：应对案件数量的持续增长，提升司法效率，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实现。但它的隐性后果，却在更深层改变了司法系统运转的制度条件。

一个需要通过语料库检验的文本假设是：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数千万份判决书中，过去十五年间的判决书论证段落正在系统性地变薄。一份1990年代基层法院关于承包地纠纷的判决书里，可以看到法官用大量篇幅分析村委会作为发包方的主张为何在法律上说不通，逐一回应了当事人的每一个论证线索；而一份2010年代类似案件的判决书，这部分常常被压缩为“原告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这一句话。这种变化不是个别法官的个人选择，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文本演化趋势：论证段被援引段替代，区分被类比替代，道义承担被安全写作消音。

如果这只是“判决书写得不够好”，那么答案很简单——加强培训，优化考核，增加人手。但过去二十年，这些措施一直在被尝试，而判决书的论证厚度并未因此恢复。这说明病灶不在一线裁决者的“会不会写”，而在于“写”这件事所依赖的制度条件正在被系统性地瓦解。本案诊断的核心判断是：效率逻辑对司法系统的侵蚀，最深的一刀不是砍在判决书的厚度上，也不是砍在裁决者的工作强度上，而是砍在司法系统用来“感知”自己正在失去什么的那套认知条件上——当“案多人少”从外部批判变成内部共识、当判决书的核心功能被等同于“定分止争”、当裁决者的职业成长路径从“在判决中学会判断”变成“在调解中学会管理”，整个系统正在一场不可见的感知退场中，失去终结社会冲突的实质能力。

本文的论证将沿以下结构展开：首先，在文献综述中梳理关于判决书功能、司法效率治理和法律职业传承的三条既有研究脉络，指出它们的各自贡献与共同盲区——它们都未触及“感知能力的代际退化”这个结构性问题。其次，在理论框架部分引入“他者性视角”这一核心概念，与法律实证主义、法律过程学派进行对话，

并借助组织社会学中“宣称理论/在用理论”的分裂、现象学的“视域”概念，以及认知科学关于分布式认知与隐性知识传承的理论资源，建立一套跨学科的分析工具。第三，在方法论部分说明本文采用的概念分析与制度诊断方法，明确推演步骤与方法的有效性边界。第四，在分析与讨论部分，分三个核心论点逐一展开：判决制度双重功能结构的单侧塌缩、合法性话语从实质说服到程序形式的转换、裁决者职业主体性在调解型管理中的静默置换，并在“反驳预期与回应”一节正面处理与法律实证主义、法律经济学的竞争性解释。最后，在结论中凝缩本文的核心发现、理论贡献与实践含义，并给出五个可独立生长、可在此后五到十年内持续推进的研究方向。

2 文献综述

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三条既有研究脉络的交汇处生成：判决书功能研究、司法效率治理的制度后果研究、以及法律职业的代际传承研究。三条脉络各自提供了重要洞见，但它们在各自边界内均未触及一个被遮蔽的结构性问题——司法感知能力的制度条件及其代际退化机制。

2.1 判决书功能研究：从形式合法性到实质论证

判决书的功能是什么？法律实证主义传统的标准回答是：判决书是裁决者适用法律规范于个案事实的记录，其核心功能是展示裁判结论的逻辑推导过程，为判决提供形式合法性（Hart, 1961/1994; Raz, 1979）。在这一传统中，判决书的充分性主要取决于规范援引的完整性和三段论推理的逻辑严密性——只要能够展示“案件事实—法律规范—裁判结论”的推导链条，判决书就完成了它在合法性上需要履行的全部义务。对手主张的回应、价值冲突中的区分、道义层面的论证承担，在法律实证主义的框架中被视为“锦上添花”的修辞品质，而非法律论证的构成性要素。

法律过程学派和美国法律现实主义对上述立场提出了有力的批评。法律过程学派强调，判决的合法性不仅来自规范的适用，还来自裁决过程中所有受影响的利益方都获得了“被倾听”的机会（Fuller, 1978）。富勒关于“法律内在道德性”的论述中，隐含着尚未被充分展开的判断：程序的正当性不仅在于“程序被遵守”，而且在于程序参与者能否在程序中“认出”自己的主张被认真对待。法律现实主义则从另一个方向切入——弗兰克和卢埃林等人通过对裁决者实际裁判行为的研究揭示，裁判结论往往先于法律推理而产生（Frank, 1930; Llewellyn, 1960），判决书中的论证不是判断过程的记录，而是为已经做出的判断“补写”理由。这一“补写”诊断，在本文关于中国当代判决书演化的分析中，将获得新的经验意涵和制度解释。

但上述两条批评脉络各自存在局限。法律过程学派关注的是“程序是否给了所有相关方说话的机会”，但未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给了说话的机会之后，裁决者是否真的“听”了——是否实质性地进入了对方的叙事框架，在对方的理由系统内部做出了回应，而不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一个“听说”的程序动作，然后回到自己的规范框架中做出独立判断？“给了机会”和“认真听了”之间，横亘着一个结构性的鸿沟，这个鸿沟正是本文的核心问题所在。法律现实主义虽然抓住了“补写”这个重要现象，但它把“补写”归因于裁决者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惯性，未能进一步追问：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会系统性地扩大“补写”行为？当“补写”不再是少数裁决者的个人选择，而成为一种被效率考核体系持续强化的制度性行为模式时，它对法律系统感知能力的长期影响是什么？

2.2 司法效率治理的制度后果研究：效率的隐性代价

关于司法效率治理的制度后果，已有大量文献从不同角度展开了讨论。国内学界对“质效考核”的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量化考核指标无法真实反映司法质量，容易引发“指标异化”——裁决者为应对考核而采取策略性行为，如年底不立案以控制收结案比、为降低改判率而主动向二审法院“请示”等（陈瑞华, 2018; 张卫平, 2016）；二是“案多人少”的矛盾在效率考核下被进一步加剧，裁决者承受过量工作压力，判决的精细化论证在时间约束下被率先牺牲（左卫民, 2017）。

国际比较法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在大陆法系传统中，成文法体系的规范密度与判决书论证风格之间存在一种内在张力：法律规范的抽象性和体系性，使得裁决者在形式上可以用法条的“涵摄”逻辑来替代

对个案特殊性的细致分析（Merryman & Pérez-Perdomo, 2007）。这种张力在效率治理的外部压力下，更容易朝着“薄论证”方向滑移——因为薄论证不仅省时，而且在成文法传统的自我叙事中更容易被正当化

（“判决书的核心功能是适用规范，不应过多讨论规范本身之外的事情”）。普通法系的判例法传统则提供了另一种对照：由于判决书的论述本身就是有拘束力的法律规则来源，判例制度内在地要求裁决者对边界问题进行区分性论证，无法简单以“案情不同”或“法条不适用”一笔带过（Duxbury, 2008）。

值得注意的是，组织社会学关于“指标治理”的研究，为理解效率考核如何改变专业组织内部的行为标准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迪马乔与鲍威尔关于制度同构的经典理论（DiMaggio & Powell, 1983）指出，当外部评估体系将一项专业实践量化为若干可比的指标时，专业共同体内部的规范标准会趋向于与这些指标对接——不是因为专业成员认为指标更准确，而是因为资源分配和职业晋升越来越依赖指标排名的制度环境中，按指标来定义“什么是好的专业行为”成为组织生存的策略。对本文的分析而言，这一理论提供了关键的概念工具：中国法院系统的质效考核，不是简单地在既有司法行为之外增加了一个外部评价维度，而是正在通过指标化的持续运作，从内部重新定义“什么是好判决”“什么是好裁决者”——当“改判率低”成为好判决的核心指标，当“调解率高”成为好裁决者的核心指标，“论证厚度”“回应充分度”“道义承担”这些无法被指标化的品质，就在共同体的话语和评价体系中无声地退场。

但既有文献在这一方向上存在一个结构性盲区：它们对“指标异化”“时间约束压薄论证”的诊断，几乎全部停留在“导致质量下降”的层面，未进一步追问——当效率治理持续二十年，压薄的不仅是当下的判决书质量，而是下一代裁决者用来学习“什么是好判决”的介质本身时，退化会从“能力削弱”跃迁到“标准的代际位移”。这不再是“判决书写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下一代裁决者内心的那杆秤，本身就不包含论证厚度、回应充分度和道义承担这些砝码”。本文将它命名为“感知能力的代际退化”——这是在既有文献中被系统性遗漏的盲区。

2.3 法律职业传承研究：隐性知识与代际介质

法律职业的代际传承如何发生，是法律教育研究与法律社会学研究共同关注的问题。传统的法律教育研究集中在法学院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上，关注的是显性知识的传递——法条如何适用、法律推理如何展开、判决书的结构如何组织等（Sullivan et al., 2007）。但组织行为学与认知科学关于“隐性知识”的研究揭示，许多专业能力的核心部分是无法通过显性教学传递的——它们依赖学徒制的边做边学、师傅的言传身教、以及共同体内部共享但未明言的职业判断标准（Polanyi, 1966; Nonaka & Takeuchi, 1995）。

法律社会学关于“法律社会化”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这种隐性传承的机制：一个法科毕业生从法学院进入法院，成为一名“真正”的裁决者，这个过程中他习得的最核心的能力，不是在法学院课堂上学到的法律知识，而是在日常工作中，通过观察资深裁决者如何写判决书、如何在疑难案件讨论中分析问题、如何面对败诉方的不满而逐渐内化的一套“实践感”——什么情况该较真、什么情况可以妥协、遇到说不通但必须解决的事怎么处理（MacCormick, 2005; Posner, 2008）。这套“实践感”的核心传承介质，至少包含三个载体：第一，资深裁决者的判决书文本——它是可反复阅读、可逐段拆解、可追溯判断过程的书写性介质；第二，法院内部的口头讨论——在合议庭讨论、案件汇报、审委会评议等场合中，资深裁决者如何提问、如何抓住案件的关键矛盾、如何在几个可能答案之间做出选择，这些现场发生的判断过程是隐性知识传递的第二载体；第三，师徒带教的日常互动——在入行头几年资深裁决者对新手裁决者判决书稿的逐段批改、讨论和示范，是隐性知识从身体到身体传递的最高密度场景。

上述研究为本判断提供了扎实的概念基础，但它们几乎都假定了一个恒定的前提——传承的介质本身是不变的。它们分析的是“在介质恒定的条件下，传承如何发生、什么因素影响传承效率”，而没有追问：当传承介质自身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当判决书从可供拆解的厚文本退化为无法提取论证方法的薄文本，当师徒带教的时间被效率考核挤压到只能在走廊里“问一句”的程度——传承还能发生吗？如果能，传递的是什么？如果不能，退化将以什么方式、在哪个时间点上从“局部能力丧失”跃迁为“系统性的感知能力坏死”？

2.4 文献缺口的精确定位

综合上述三条脉络，本文识别的文献缺口可以被精确表述为：既有文献在判决书功能、司法效率治理、法律职业传承三条线上各自深入，但它们之间缺少一种交叉性诊断——没有研究者系统性地追问过，当效率治理持续压薄判决书的论证厚度，被压薄的文本不再能承载判断方法的代际传递，下一代裁决者的“实践感”中缺少了“进入对手叙事框架并做出区分性论证”这一核心成分，整个司法共同体的感知能力将在某个时间点上发生代际位移——一种“在高速运转中失去感知自身退化方向的能力”的锁定效应。

这个缺口，正是本文的理论切入点。本文的贡献不是在三条脉络各自内部做增量补充，而是在它们交汇的盲区上，安置一个新的核心概念——“他者性视角的制度化条件”——并以此为核心，重构对“法律生命力”这一根基性追问的理解方式。

3 理论框架

3.1 核心概念定义

他者性视角。本文提出的“他者性视角”，是指裁决者在面对纠纷时，能够在自身的规范框架之外，进入当事人的叙事框架，并在当事人的理由系统内部做出回应的能力。它与“同一性视角”构成一个对子。同一性视角是法律系统默认的运作方式：将进入法律场域的纠纷纳入既有的分类格（法律关系、案由、适用规范），对可被分类的部分进行加工，将不可被分类的部分排除在法律论证之外——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与本案无关联性”“无事实依据”等。同一性视角不是错的——它是法律系统得以高效处理大量纠纷的基本操作方式。但它有一个结构性的盲区：那些无法被现有分类格容纳的冲突维度，在同一性视角的加工中会被系统性排除；而那些冲突，恰恰可能是纠纷真正的导火索。

他者性视角的任务不是替代同一性视角，而是在同一性视角完成规范操作之后，额外追问一个问题：那个被排除掉的部分——败诉方真正在意、但无法被转化为法律论证格式的那个主张——是否被认真对待过？它之所以被称为“他者性”，是因为它的视角不从裁决者自身的规范体系出发，而是从那个“不被规范体系包含、但被纠纷带到裁决者面前的人”的叙事出发。法律实证主义和传统法理学的主流叙事中，并不包含“他者性视角”作为法律核心职能的概念位置——法律被定义为“规范的适用”，裁决者是对规范进行操作的主体，“感知他者”不属于法律的本职工作。本文的核心判断是：将“感知他者”从法律的核心职能中排除，是效率逻辑能够如此深层渗透进法律系统的概念前提；而恢复他者性视角的制度化条件，是法律重新获得实质终结冲突能力的根本出路。

判决制度的双重功能结构。判决制度不是单一功能体。本文将其功能拆解为两个不可通约的层面。第一是决断功能：判决必须为纠纷提供一个确定的、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终局性结论，让冲突在法律层面被了结。决断功能要求效率、确定性和终局性——裁决者需要在有限时间内做出判断，不能无限期地等所有可能的情况都弄清楚。第二是认知基础设施功能：判决在长期司法实践中发挥着知识生产与代际传承的作用——它为后继裁判提供了论证资源（可被区分、可被援引、可被拆解的判断过程），为下一代法律人提供了学习材料（通过阅读判决书来学习“在边界问题上如何做判断”），为法律共同体提供了共享的认知框架（通过判决书的累积来沉淀法律方法）。

这两个功能在结构上是不可通约的——不是“需要平衡的两端”，而是在同一套制度条件下就不可能被同一套评估体系同时激励。决断功能被效率考核系统性地奖励——结案越快、发回改判越少、调解越多，越符合“好”的标准。认知基础设施功能中的论证厚度、区分技术、道义承担的代际传递，不仅不受奖励，而且在“安全写作”的策略下主动避险——“写越少越安全”。因此，本文诊断的“判决制度退化”不是“判决书质量下降”这个常见说法能概括的——它是一种功能结构的单侧塌缩：决断功能被超量满足，认知基础设施功能被系统性掏空。

代际感知能力退化。感知能力的退化不是“某几个裁决者不会写判决书”，而是一个代际过程。当下入行不足十年的这代裁决者，是在“补写”和调解型管理主导的制度环境中完成职业社会化的。他们阅读的判决书

样本，大量是论证段被援引段替代、区分被类比替代、道义承担被安全写作消音的薄文本。他们接受的在职训练，越来越偏向“如何高效结案”而非“如何在边界案件上做有厚度的论证”。他们被带教的方式，正在从“师傅逐段批改判决书草稿”退化为面授口传乃至走廊问答。当这一代裁决者成为庭长、审委会成员、带教师傅，他们内心那杆衡量“什么是好判决书”的秤，本身就不包含论证厚度和道义承担这些砝码。他们不是故意降低标准，而是标准已经从内部被重新锚定——退化从“能力损失”跃迁为“标准的代际位移”。这套机制，与制度自我描述的反噬形成闭环：效率逻辑压薄了认知基础设施功能；被压薄的介质导致下一代裁决者无法从文本中习得感知能力；下一代裁决者内心的标准被重新校准为“薄是常态”；以新标准为主导的制度内部不再产生对“变薄”的不适感；没有不适感的系统不会启动任何自我纠正机制；效率逻辑继续压薄——如此循环，加速退化。

制度自我描述的反噬。本文借用组织社会学中“宣称理论”与“在用理论”的概念区分（Argyris & Schön, 1978），来诊断法律系统自我理解的变化如何成为退化的加速器。宣称理论是一个组织对外公布、对内自我陈述的那套“我们是什么、我们做什么”的叙事——对司法系统而言，包括“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等官方话语。在用理论是组织在日常操作中实际驱动行为的隐性逻辑——在当前司法系统中，质效指标的完成度、改判发回的风险规避、案件消化速度，构成了实际的在用理论。

宣称理论与在用理论之间的缝隙，本身不是问题——几乎所有组织都存在这种裂缝。但当二者之间的裂缝大到一定阈值，而组织内部用来诊断这种裂缝的概念工具本身又是在用理论塑造的、不包含识别裂缝所需的度量单位时，反噬就发生了：在用逻辑对系统的侵蚀无法在宣称层面被陈述，因为宣称的语言本身不包含感知这种侵蚀的词汇。具体到司法系统，“感知他者”这个概念，在法律实证主义的宣称语言中没有合法的位置——“对手回应充分度”不是法理学传统中的核心评价维度。因此，当在用理论系统性地压薄认知基础设施功能时，宣称理论没有能力把它称作“问题”，它只能被表述为“效率与公正的平衡”这个老话题——而“平衡”这种模糊措辞，恰恰为效率逻辑的持续推进提供了合法性掩护。

3.2 命题与假设

本文的核心命题可以凝缩为以下三个层次：

命题一（功能结构塌缩）：判决制度的认知基础设施功能（论证资源的代际传递、感知能力的职业社会化、共同体认知框架的累积）正在被效率治理逻辑系统性地压薄，而决断功能被超量满足。这种单侧塌缩不是因为裁决者不会写、不愿写，而是因为激励结构在制度层面同时奖励薄论证（安全写作）并惩罚厚论证（改判风险、写作时间成本的效率敏感）。

命题二（标准代际位移）：当在“补写”和调解型管理环境中完成社会化的裁决者成为系统主体，他们内心关于“什么是好判决书”的标准已经从“论证厚度、区分难度、道义承担”位移到“程序合规、证据充分、结论正确”。一旦发生这种代际位移，任何试图恢复论证深度的改革努力，都将在执行层被新的内心标准消解——“写那么厚有什么用，对方也不会看”这种发自内心的反问，比任何显性的制度抵抗都更难撬动。

命题三（他者性视角的决定性）：一个司法判决能否实质终结冲突——不只是让案件从审判管理系统中消失，而是让冲突在社会生活中失去继续生长的动力——在控制了规范援引完整性、程序正当性、案件类型和审级等变量后，独立取决于裁决者在多大程度上实质性地回应了败诉方的主张、在边界问题上做出了区分性论证、在道义层面承担了判断的伦理重负。法律实证主义关于“终局效力来自规范的确定适用”的核心判断，在涉及价值冲突的边界案件中，将被关于对手回应充分度的经验证据所修正。

这三个命题之间构成递进关系：命题一描述功能塌缩的结构事实；命题二揭示这种塌缩如何通过代际传承从“能力削弱”跃迁为“标准的锁定”；命题三将功能性诊断推入可裁决的经验检验——为“他者性视角”作为法律生命力独立变量的理论主张，给出一个可以被法律实证主义反驳、可以在五年内被追踪数据验证的具体检验方案。

3.3 跨学科理论资源

本文的跨学科调用涉及组织社会学、现象学、认知科学与教育哲学。这里必须显式说明每项调用的有效性边界。

组织社会学：宣称理论/在用理论。阿吉里斯与舍恩（Argyris & Schön, 1978）提出的宣称理论/在用理论框架，原用于诊断企业组织中“宣称的价值观”与“实际驱动行为的逻辑”之间的分裂如何导致组织学习能力的丧失。本文借用这一框架来分析司法系统自我描述的变化，有效性基于以下同构性：（1）司法系统像企业组织一样，同时拥有明确公开的自我叙事（司法公正、定分止争）和实际驱动操作的内在逻辑（质效指标的完成度、改判风险的规避）；（2）两者都存在“当在用逻辑持续侵蚀宣称为核心价值的能力时，宣称语言本身缺乏识别这种侵蚀的概念工具”这一反噬机制。但本文的调用也存在边界——企业组织的宣称理论与在用理论的分裂，可通过市场反馈和财务危机被外部纠正；司法系统的自我描述缺乏等强度的外部纠正机制，因为公众对判决书论证厚度下降的感知，不如消费者对产品质量下降的感知那么即时和直接。这一差异意味着，司法系统自我描述的反噬效果可能比企业组织的同样机制更持久、更难被自我纠正。

现象学：视域概念。胡塞尔（Husserl, 1936/1970）提出的“视域”概念——每一个意识行为都在一个由之前经验累积而成的、未被主题化但正在运作的背景下发生——为本文诊断代际传承介质变化的影响提供了精确工具。在现象学的意义上，一个裁决者面对一份判决书草稿时所“看见”的内容，不仅取决于他眼前这份草稿的字面信息，更取决于他此前阅读过的、批改过的、被师傅带着逐段分析过的那几百份判决书在他体内沉淀的“视域结构”——这结构让他对某些文本特征（如论证的跳跃、区分的缺失、道义承担的回避）产生一种“这里不对”的内部不适感，即使他说不出违反了哪条写作规范。当传承介质从厚判决书的文本浸泡退化为面授口传乃至走廊问答，新裁决者视为当然的视域结构本身就“窄”了——他们能看见援引是否完整、结论是否清楚、程序是否走完，但看不见论证是否充分回应了对手、在价值冲突处是否做出了区分、在必须承担伦理重负时是否躲到了法条援引的后面。这一调用由代际传承介质变化的经验观察支持，但其有效性限定在对阅读经验与文本感知的微观分析层面——不能以此解释宏观制度变迁的全部动力。

认知科学与教育哲学：隐性知识与分布式认知。波兰尼（Polanyi, 1966）关于“隐性知识”的经典论述——我们知道的多于我们能够言说的——以及诺纳卡和竹内（Nonaka & Takeuchi, 1995）关于隐性知识在组织中传递需要“共同化”过程（通过共同体验而非显性教学来传递）的研究，为本文关于“判决书是隐性知识传承介质”的判断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据此主张：判决书不仅传递显性的法律知识（法条如何适用），更承载着隐性的判断方法——如何在众多事实中识别关键变量、如何在多个法律解释选项之间做出选择、如何对一个无法被驳倒的对手主张做出“我不同意但我在乎”的回应。这些隐性知识无法通过法学院课堂的显性教学传递，只能在逐段阅读、逐段批改、逐段重写的身体性练习中被习得。当这个质介变薄，传递的不是“教少了”，而是某种身体记忆的断代。此调用的有效边界在于：隐性知识的概念框架本身不能直接提供“应该恢复到什么厚度”的精确阈值——它只能解释为什么要恢复，不能替代实证研究来界定不可逆退化的具体拐点。

4 方法论

本文是一项概念分析与制度诊断相结合的研究。它不涉及一手经验数据的采集，而是在既有制度事实、公开可获取的判决书文本和已有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概念框架的重构揭示一个被遮蔽的结构性问题。

4.1 研究设计

本文的分析单位是判决制度的功能结构、判决书文本的演化趋势、以及裁决者职业社会化的代际机制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设计沿以下四个步骤展开：

步骤一：制度功能的结构解剖。将判决制度拆解为决断功能与认知基础设施功能两个不可通约的层面，分析效率考核体系如何在不同功能层面上产生非对称的激励效应。这一分析的中国经验基础来自公开的司法改革文件（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质效评估的历年指导意见）、研究者对法院考核制度的既有实证研究（如陈瑞华，2018；左卫民，2017）、以及裁判文书网上可公开获取的判决书文本作为辅助例证。

步骤二：文本演化的可编码特征提取。在本文分析诊断的合法性话语从“实质说服”向“程序形式”转换的基础上，提取七个可在判决书文本层面被独立编码的特征——对手主张复述完整度、对手主张回应匹配度、区分标识词使用频次、道义谓语使用密度、情态动词的语法稀释度、段落功能结构的压缩程度、援引-论证比值的倒挂。这些特征构成一个可被后续实证研究操作化的分析框架。本文在此处不声称已完成该编码，而是给出编码方案的操作化定义，为未来五年内的经验研究提供可直接采用的方法论工具。

步骤三：代际机制的推演。基于组织社会化与隐性知识传承的既有理论资源，推演当前在“补写”与调解型管理环境中完成社会化的裁决者一代，其内部评价标准可能发生的位移方向，并给出可被检验的预测——这些预测在本文6.5节（未来研究方向）中具体化为五个独立可执行的研究分支。

步骤四：竞争解释的正面回应。与法律实证主义的终局效力理论和法律经济学的“和解作为高效方案”规范论述进行正面对话，在4.3节明确本文方法的内在局限，并在5.4节（反驳预期与回应）系统处理可能的最强反驳。

4.2 分析策略

本文的核心分析工具是概念比较与制度条件诊断。这种方法论选择基于以下理由：本文要揭示的问题——“感知能力代际退化”——在其当前发展阶段，尚不可通过一项单一的经验研究来完整处理。它需要先被概念性地建构为一个有明确结构的问题，才可能在后续研究中被拆解为若干独立的、可逐一检验的子命题。这不等于说本文仅提供哲学论述。本文在每一步推演中都给出了可操作的经验检验入口——从判决书文本的七个可编码特征，到代际裁决者内心标准的语义网络分析，到类案系统栏位效果的准实验设计。方法论上，本文兼有概念研究对“新问题空间”的开拓功能，以及嵌入性经验接口对后续实证研究的衔接作用。

4.3 方法局限

本文的方法存在三重局限。第一，概念推演所依赖的中国司法系统的制度素材，主要来自既有研究者和本文作者对公开信息的综合，未经独立的田野调查验证——这意味着本文对“效率考核的日常运作如何具体影响裁决者写作行为”的描述，精度限于现有文献提供的经验基础。第二，本文给出的七个可编码文本特征，其变化趋势的判断来自对裁判文书网判决书的定性阅读印象，而非系统性的定量编码——本文在6.5节将这些判断转化为可检验的实证预测，正是为了将目前以诊断性判断形态存在的主张，尽快推入可被经验验证的轨道。第三，本文从中国司法系统的经验基底出发构建的分析框架，其跨法系有效性尚未被验证——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中，判决书的论证传统、判决的判例地位、以及效率治理的制度形态与中国有结构性差异，“他者性视角的制度条件”在这些法系中是否以同样机制发挥作用，需要后续的比较法实证研究来验证或修正。

5 分析与讨论

5.1 判决制度的双重功能结构及其单侧塌缩

对判决制度的既有讨论，习惯于将它作为一个单一功能体来看待——“判决就是解决纠纷”。这个直觉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很少有人追问：解决纠纷和解决纠纷是不同的。“把案件从审判管理系统中消化掉”，和“让冲突在社会生活中失去继续生长的动力”，这两件事在操作层面可以高度重合，但在深层结构上依赖完全不同的制度条件。

本节拆开这个被“定分止争”四个字覆盖掉的结构性差异。判决制度同时承担着两种不可通约的功能。第一种是决断功能：给出确定性的终局结论，让纠纷在法律上被了结，避免无限期的争议反复。决断功能要求效率——案件不能无止境地审下去；要求确定性——各方需要知道什么是法律上最后的说法；要求终局性——判决作出后应有约束力，不得被轻易推翻。这一功能在效率和程序层面被质效考核体系系统性地满足并强化——结案率、审限内结案率、改判发回重审率，这些指标的中轴就是决断功能的准确、快速、稳定运转。

第二种功能，本文称之为认知基础设施功能。它不是伴随决断功能自动发生的副产品，而是判决制度在长期运作中为法律共同体持续提供的三种基础性资源。第一是论证资源的代际累积。每一份有论证厚度的判决书，不只是处理了手头这一个纠纷——它为后继裁判提供了可被区分、可被援引、可被拆解的分析框架。当一个疑难案件出现，裁决者可以在前辈的判决书中找到“类似的问题是怎么被切开、怎么被回应的”——不是找到答案，而是找到切开问题的方法。第二是判断能力的职业社会化。法学院的毕业生不是天然会判断的。判断能力——在不确定的、有两个以上可能答案的边界问题上做出一个必须伤害某一方、但又必须在论证上对这一伤害负责的决定——这种能力，不是在法条课堂上学会的，是在逐段阅读资深裁决者的判决书、在自己写判决被师傅逐段批改回来的过程中，一点一点沉淀进身体里的。它的传递介质，是那种写得厚、写得清楚、写着“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选了这条路而不是那条路”的判决书文本。第三是共同体共享认知框架的形成。当一个法律共同体内部，不同类型案件的边界上持续有厚判决在推进区分性论证，共同体成员之间会形成一个共享的感知框架——什么情况属于“真的一样”可以援引，什么情况属于“表面一样实际不一样”需要区分，什么情况属于“完全不一样”不可援引。这个框架不是写在法律条文里的，是写在一代又一代判决书累积的区分实践中，被共同体成员在长期阅读中内化的。

决断功能与认知基础设施功能在结构上不可通约。这不是修辞上的强调，而是一个可以从激励相容的角度严格推导的判断。效率考核体系奖励的每一项指标——结案速度、低改判率、调解率——都在强化决断功能的运转。同时，认知基础设施功能的每一项核心操作——在判决书中展开区分性论证、在边界问题上留下可被后继裁决者使用的分析框架、在道义层面为判断承担伦理重负——在同一条考核体系下，都是被隐性惩罚的。展开论证占用结案时间，降低效率指标；区分性论证暴露裁决者的判断路径，增加被上级法院改判时可被攻击的靶点（不是论证错了，而是“论证了”这件事本身就给了二审法官一个不同意你的文字入口——如果只写结论不发论证，二审法官的审查入口就只剩下最终结论的对错，而后者远比前者难推翻）；道义承担与安全写作的策略直接冲突——在意识形态和信访双重压力下，写越少在政治上越安全。这种非对称激励的效果不是“质量下降”这四个字能描述的。它导致的是功能结构的单侧塌缩：决断功能被超量满足，认知基础设施功能被系统性掏空。判决书还在出，纠纷还在结，案件还在从审判管理系统的流水线上往下走——但那些让判决书成为法律共同体知识资产的东西，那些让下一代裁决者从中学到“在边界上怎么判断”的东西，正在从判决书内部消失。

这不是一个“应该写厚”的规范性倡导。它描述的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结构事实。当认知基础设施功能被系统性压薄，第一个承受后果的不是当下这批裁决者——他们已经学会了判断（或者至少有机会学会过），他们的判断能力已经通过二十年前那些还写着厚论证的判决书、十五年前还有时间逐段批改草稿的师傅那些有耐心的午后，沉淀进了他们的身体里。第一个承受后果的是入行不足十年的那批更新一代的裁决者。他们入行时，可读的判决书样本已经普遍变薄，师傅已经没有时间走在走廊之外的地方带教，“在判决中学习判断”这条路径已经从制度条件中被实质性截断。他们仍然在学习怎么结案，怎么适用法条，怎么写出一份在质效考核体系中不出错的判决书——但他们没有在学怎么在边界案件上做出有厚度的论证，因为他们眼前没有这种样本，身旁没有会逐段批改的人，头顶上的那套评估体系也不奖励这么做。这个后果要在此后十年到十五年，当他们成为庭长、审委会成员、带教师傅的时候，才会变成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他们用来衡量下一代的秤，本身就不包含论证厚度的砝码。

5.2 从实质说服到程序形式：判决书文本的合法性话语转换

判决书写薄了——这个说法本身不够精确。薄是一个比喻，它没有区分两种不同质地。一份判决书完全可以很长，援引很多法条，回顾很多证据，但仍然很薄——薄在论证层。本节的任务是吧“薄”这个概念，拆解成可识别、可编码的文本特征，并揭示这些特征的变化不是一个写作质量的问题，而是判决书内部合法性话语的一次不可见的位移：从实质说服到程序形式。

所谓实质说服，是指判决书的合法性来自它对败诉方主张的充分回应。败诉方来到法庭，带着一套自己的叙事——他对事实的理解、他对法律适用的期待、他对自己为何应当胜诉的理由框架。这份叙事在规范上可能是错的，但它在叙事内部是自洽的。实质说服型的判决书，不只是用法条来宣告他错了，而是进入他的叙事框

架，在他的理由系统内部，告诉他在哪个节点上、因为什么原因，法律不能接受他的主张。这样一份判决书，败诉方读完后仍然可能不服，但他无法说“我说的话没有人听”——因为他的每一句话都被认真听过、然后被认真回应过。他输了，但他输得明白。“我的主张被认真对待过”——这种认可本身，就是判决实质终结冲突的根基。

所谓程序形式，是指判决书将合法性的来源从论证的充分性转移到援引的完备性和程序的合规性。它的标准操作是：（1）完整列出相关法条；（2）展示事实认定的过程；（3）用法言法语宣告结论；（4）在需要评价败诉方主张时，使用“不予采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与本案无关联”等高度凝缩的消解句式，以一次性的笼统驳回替代逐点回应。这种操作在形式合法性的层面是完备的——法条援引完整，事实认定遵循程序，结论正确。它唯一“薄”的地方，是败诉方的主张没有被实质性地进入过。裁决者在他的叙事框架之外，用法条这个外部工具宣告了他的叙事的无效。这种操作是高效的，在大部分案件中也是够用的。但它在涉及价值冲突的边界案件中，产生了一个不可见的长期效果：败诉方在法庭上没有获得的“被认真对待”的承认，不会凭空消失——它会转移到社会的其他部分，以别的形态继续生长，然后在某一个未来时间点，以更激进的、不再穿法条外衣的形态重返。那时，法律已经认不出这就是当年自己没处理的那件事。

这个合法性话语的位移，会在判决书文本中留下可被计算语言学家直接识别并编码的痕迹。本文在以下给出七个可编码文本特征的操作化定义。这七个特征不是同时出现的“症状清单”，而是一个有方向性的演化矢量的不同维度——当它们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段内同步朝一个方向移动，系统性的合法性话语转换就发生了。这个转向的第一个可操作标志，是对手主张从判决书中消失的程度。可操作指标是判决书中直接引用败诉方主张的文字数量占全文字数的比例。当一份判决书把对手的完整叙事压缩成“原告诉称”“被告辩称”后面的一小段，再把这一小段在后面用一个“不予采信”整体驳回，裁决者没有在文本层面进入对方的理由系统。这个比例在过去十五年间的持续下降，是可以从裁判文书网上被独立编码员用简单字数统计验证的。第二个标志是，当裁决者回应对手时，他是否独立处理了对方每一个论证线索，还是把所有线索打包进一个通用驳回句式。可操作指标是判决书中独立回应对手主张的段落个数，除以对手在诉状中可被识别的独立论证线索个数。当这个比值显著小于1——意味着有多条对手论证线索被合并回应或完全不予回应——判决书回应功能的充分性就在结构上被掏空了。第三个标志涉及区分技术。在疑难案件中，裁决者的核心工作不是“找最相似的先例然后跟着判”，而是“判断本案在某些关键维度上是否不同于最相似的那个先例，以至于不该跟着判”。这个判断会在文本中留下区分标识词——“本案不同于……”“……不构成相反结论”“……有其特殊性”等。区分标识词在单位文本长度中的出现次数，可以从时间轴上直接观察。预测方向很明确：当安全写作和效率逻辑同步施压，区分被类比替代，这些标识词出现的频率在过去十年间将持续下降。第四个标志是道义承担在语言层面的撤退。裁决者在面对“这个行为不只是违反了某条规定，而且侵害了某个应当被保护的法益”这种情况时，是否使用道义评价语言——如“构成对……的严重侵害”“背离了……的基本要求”——而不只是援引法条宣告违法性。道义谓语的密度，是一个可以被编码和跨时段比较的指标。它的持续下降意味着，裁决者正在用法条的宣告功能来替代判断的道义承担功能——不是法条不该援引，而是只援引法条、不对法条保护的道德价值进行论证，是把判决书的伦理纵深抽掉。第五个标志是情态词的语法稀释。在遇到需要在不同法律解释之间做选择的场合，裁决者是否使用模糊情态词（“可认为”“宜”“倾向于”）来替代确定性情态词（“应当”“必须”“只有……才……”），以降低自己判断的可攻击面。确定性情态词与模糊情态词的比值下降，在涉及社会敏感议题的判决书中尤为显著——因为在这些案件中，安全写作的压力最大。第六个标志是段落功能结构内部重心比值的降低。一份完整的判决论证通常包含四个功能段落：事实描述、争议焦点提炼与对手主张复述、裁决者分析区分、结论。这四个功能段中，第三个——裁决者分析区分段——是判决书论证厚度的核心承重层。当这个段落的长度占全文长度的比例持续下降，意味着判决书内部的重心从“分析”移到了“宣告”，它的论证质量在结构上被掏空。第七个标志是分析性文字与援引性文字的相对消长。一份可以在形式层面显得“援引充分”的判决书，可能分析性文字的篇幅远低于法条援引（不含分析）的篇幅。当这个比值持续下降——分析性文字相对于援引性文字在变少——判决书正在从“援引辅助分析”变成“援引替代分析”。援引替代分析的判决书，在援引完整性这个维度上可以是满分的，但在回应充分度的维度上是空洞的。

以上七个特征构成一个可独立编码、可跨年度比较、可跨案件类型分层分析的完整文本分析框架。它不依赖于裁决者的自我报告（裁决者可能自己也不察觉自己的写作方式在变），不依赖于外部评价（专家对判决书质量的打分），只依赖于判决书文本中可被第三方编码员按编码手册独立识别并计数的语言特征。这个框架的用意不是现在就完成实证（本文不做一手经验研究），而是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一套可以直接掏出来就用的方法论工具——他们可以去裁判文书网抽样、编码、计算这七个指标在时间轴上的变化，把本文在这里陈述的定性判断，推入可验证、可重复的定量证据层面。如果有研究者发现其中某些指标在统计上无显著变化趋势，那本文关于合法性话语转换的某些具体子命题将被修正——而这恰恰是这套分析框架的工程价值所在：它不是一座必须整体被接受的教堂，而是一个每一块砖都可以被独立敲击检验的建筑。

5.3 调解型管理：职业主体性的静默置换

前两节分别从制度功能结构和文本演化两个层面诊断了效率逻辑对判决制度的侵蚀。本节将诊断推入裁决者个体的职业身体内部，去分析另一个平行发生的、但同样不可见的替代过程。

调解作为结案方式，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在适合调解的案件中——双方当事人有持续关系、冲突的利益可以被妥协、判决带来的零和后果对双方都是次优——调解是比判决更优的纠纷解决方案。本文对调解的讨论，不在“判决好还是调解好”这个虚假的二选一里，而在另一个被遮蔽的结构性问题上：当效率考核的持续推力让调解从一个备选方案变成裁决者的默认职业策略，当调解让裁决者从判决的道义重负中系统性地卸责，当调解在代际传承中替代了以判决论证为核心的职业社会化过程，它就悄然完成了一次跃迁——从“一种结案模式”变成“一种新职业物种的孵化器”。

调解型管理与判决型裁决之间的核心区别，不在工作内容的差异，而在职业内核的差异。判决型裁决的职业内核是在不确定的道义冲突中，做出一个必须伤害某一方、但又必须在论证上对这一伤害负责的判断。这个过程中，裁决者需要承受三重负担。第一重是认知负担：他必须进入双方各自的叙事框架，在两个自治但互不相容的理由系统之间做出判断——这不是选对法条，这是在法条沉默的地方切开一个边界。第二重是伦理负担：他必须承认自己的判断将实质性改变至少一方当事人的生活轨迹，而在有些案件中，无论他怎么判，都会有人承受真实的痛苦——他必须面对这个痛苦，在判断中承担这个痛苦的道德重量，而不是假装它不存在。第三重是职业风险负担：他在边界案件上做出的区分性论证，会暴露他的判断路径和判断标准，这些被暴露出来的东西，可能被上级法院改判、被同行批评、被当事人信访——他选择承担这些风险，因为他认为在边界上留下自己的论证足迹，是裁决者职业生命的本分。调解型管理的职业内核则完全是另一套。它的核心任务不是在道义冲突中做出判断，而是在利益冲突中找到妥协方案。它的三重负担被天然地减掉了。第一，认知负担被消减——裁决者不需要进入双方的叙事框架去做不可通约的价值选择，只需要在双方各自的底线之间寻找可以交换的利益空间。第二，伦理负担被转嫁——裁决者不需要为“谁对谁错”负责，因为他没有“判”谁对谁错，他只是帮助双方达成了一个他们自己同意的方案。调解的合法性来自当事人的合意，而不是裁决者的判断。第三，职业风险负担被规避——调解书不需要写论证，只需要记录协议内容，没有改判风险，没有信访靶点（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再去信访就失去了法律上的着力点）。从裁决者个体的角度看，这三重负担的同时卸除，在“案多人少”、考核指标步步紧逼的日常压力下，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不是裁决者“变懒了”，是系统在他面前放了同样多的选择，但其中一个选项让他每一天都能轻松一点、安全一点、早点下班——而有一天这个选项从他内心的“备选方案”变成了“默认选择”。

这个从选择到默认的位移，是以一种裁决者内部不自察的方式完成的。在效率考核“调解率”指标多年持续的软性引导与晋升激励的日常运作中，裁决者一开始只是“多调几个案子来完成指标”，处于疲劳状态。然后他慢慢发现“调解确实省事”，案件消化快、没有后顾之忧，他对调解的态度从疲劳转为适应。再然后，“调解省事”这个起初被视为“不得已”的策略，在做了几百次之后，开始内化为价值观——“调解比判决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真正的好法官不是写一手漂亮判决书的人，是能化解矛盾的人”。这个价值观的自我说服一旦完成，调解就从一种工具性的行为策略，变成了一种伦理性的职业认同。最后，在自我说服阶段稳定下来的裁决者成为庭长、审委会成员、带教师傅，在日常工作中告诉新一代裁决者：“别较真，能让双方各退一步最好”——他们把调解理念和实践策略，而非判决论证技术，作为职业智慧的核心传给下一代。这三个拐

点走完之后，“好裁决者”的职业标准在共同体的日常话语和隐性评价中被重新锚定——不再是写出有厚度判决的人，而是能快速消化案件、促成调解、不惹信访的人。这个新标准一旦经过两到三代人的代际传递而彻底稳固，任何试图“恢复判决论证深度”的外部改革，都会被执行者真诚地认为“这不是我们该做的事”——不是消极抵抗，是价值层面的不认同。你无法用一套政策工具去修复一个已经不认为自己是问题的系统。

调解型管理的代际传递后果，与前述的认知基础设施功能退化互相加固。当入行裁决者从师傅那里接手的职业法宝不是“怎么在边界案件上切分问题”，而是“怎么在一堆纠缠不清的主张中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点”，他们不是学少了——他们是学了另一件事。他自己可能是一个处理群体纠纷的好调解员，但他不再是一个能在边界判决中为法律共同体积累论证资源的人——他自己不写厚判决书，也不带徒弟写厚判决书，下一代人彻底从“写判决”的身体记忆中断绝。这整个替换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环节需要恶意的行动者。每件事都是合理的——案多人少是事实，调解率高在考核表上是好看数字，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协议通常更易履行，裁决者规避职业风险是人之常情。正是这种每个环节的局部合理性，使得整体结构的变形对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是不可见的。

5.4 反驳预期与回应

本文提出的核心主张——法律的生命力取决于他者性视角的制度化条件，司法系统正在经历感知能力的代际退化——可以从至少两个方向遭遇有力的反驳。

反驳一：法律实证主义的终局效力论述。

法律实证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判决终局效力的根基在于规范的确定适用和程序的完备。只要裁决者正确地识别了案件事实、准确地援引了可适用的法律规范、完成了三段论推导并遵守了法定程序，判决的合法性基础就已经被充分满足。对手主张是否被充分回应，属于判决书的修辞品质——它可以被追求，但不是判决合法性的构成要素。从这个立场出发，本文的整个诊断都是对一个“锦上添花”的品质提出了过度要求。如果判决的终局效力——在实证中被操作为判决作出后五年内被申诉被改判的比例——确实只取决于规范援引完整性和程序正当性，而不取决于对手回应充分度，那么本文的核心主张就将被大幅修正：他者性视角不是法律生命力的独立变量，它是同一性视角操作优秀时的副产品，二者的分离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

对于这一反驳，本文的回应策略不是先在理论层面否定它，而是把它转化为一个可以在经验上被裁决的实证问题。本文在理论框架部分已给出了可操作的分离变量Z（“对手回应充分度”——他者性视角操作的充分性），并设计了2×2判别格（规范援引完整性×对手回应充分度）。本文对实证主义终局论述中的核心变量“终局效力”，进一步操作化为三个可追踪的长期指标：判决作出后五年内的申诉率与该法院同类型案件平均申诉率的比值（对冲法院自身案件量波动的影响）；判决在同一争议焦点上被后续判决作为区分性依据援引的频次及其与平均援引频次的对比；判决被驳回申诉的裁定中引用的“非终局性宣告”句式的出现频次——这些句式在申诉被驳回裁定中的出现频次越高，说明原审判决对申诉人主张的回应被更高级别的法院视为终局性屏障，即间接衡量判决实质终结冲突的能力。本文的预测是：在规范援引完整但不充分回应对手主张的判别格中，边界案件（如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争议、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新型权利的确认诉讼）的五年内申诉率显著高于规范援引完整且充分回应对手的判决，且这一差异在审理了“高争议”案件的法院中更为显著。如果实证结果与本文预测相反——即此判别格中，回应充分度对终局效力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这意味着他者性视角在法律系统内部的作用可能被本文高估，或它只在特定案件类型（而非所有边界案件）中起独立作用。这种结果将显著修正本文理论主张的适用范围，但不会完全否定“感知能力存在退化趋势”这一基础判断——因为即便回应充分度对终局效力的独立贡献被证伪，判决制度认知基础设施功能的代际退化仍然是一个可以被判决书论证厚度、区分频次等独立指标验证的结构性事实。

反驳二：法律经济学的“和解作为高效方案”论述。

法律经济学传统（以波斯纳为代表）提供的规范性论述是：和解（在和解程序下也包括法院调解）是比审判更高效的纠纷解决方案，因为它节省了审判的公共资源，让当事人自己通过谈判达成帕累托改善。从这个立

场出发，本文对“调解型管理替代判决型裁决”的批评，是对一种高效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担忧——如果调解能更快解决纠纷、更低成本实现当事人合意，裁决者调解率的提升应该被视为制度进步而非退化。

对于这一反驳，本文的回应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接受法律经济学在“资源效率”维度的全部论述——对于适合调解的案件类型，调解确实是比审判更优的选择。本文的诊断与这一主张之间不存在矛盾，因为本文批评的对象不是调解本身，而是调解作为默认职业策略在代际传承中替代了判决论证功能、导致裁决者职业主体性中“判断力”成分被系统性地边缘化。法律经济学的效率分析测量的是“结案这一时点上的资源消耗”，它不包含一个长达十到十五年的代际传承视角——它没有工具去测量“当这一代裁决者不再练习判决论证，下一代裁决者面临边界案件时的判断能力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不是说法律经济学错了，是说它测量的维度和本文关注的维度是不同的，二者之间不是“对错”之争，而是“视角的可通约性”问题。

第二层，本文进一步主张，即使仅在“效率”维度内部，调解的长期效率也需要被重新审视。当一个涉及价值冲突、不存在双方都能接受妥协方案的边界案件被强行推入调解轨道，表面的“调解成功”往往是以一方当事人的实质性权利减损为代价换取的（这方当事人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谈判能力弱势、或身体上无法继续承受诉讼的心理压力而接受了表面合意），这层被调解书封存的冲突不会消失——它会在社会场域中继续积蓄，然后在某一个未来时间点，以更激进的形态重返法律系统。届时，它消耗的司法资源可能远超当初如果做出一份带有完整论证的判决所消耗的资源。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需要后续的追踪实证研究来验证——那么法律经济学关于“调解节省资源”的主张，在价值冲突类案件中的长期效率，实际上是建立在“将成本推迟到未来”的隐形代价之上的。这个反驳不取消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要求它在效率函数中增加一个目前被忽略的时间变量——冲突解决的代际耐久度。

5.5 综合讨论：他者性视角的制度化条件

以上三节各自从功能结构、文本演化、职业主体性三个侧面切入了同一件事——效率逻辑对司法系统的渗透。本节将它们合在一起，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效率逻辑确实在系统性地压薄感知条件，那么扭转这种退化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本文的答案是：在效率逻辑与传统法理自我描述互相加固的压力下，法律系统的出路不是“让裁决者写得更认真”，而是去重建他者性视角的制度化条件。这不是号召“每个裁决者都做英雄”——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抵抗在制度层面的反压下是不可持续的。前五轮诊断反复揭示的一个核心发现是：当前所有指向“改进判决质量”的改革方案之所以收效甚微，是因为它们试图在效率逻辑和传统法理自我叙事共同塑造的制度框架内改进——但这个框架本身的激励结构和概念语言，已经把“对手回应充分度”“道义承担”“区分性论证”这些他者性视角的核心操作，排除在“什么是好裁决者”“什么是好判决书”的根定义之外。在一个“好”的标准已经被重新锚定的系统内部，任何指向修复旧标准的政策工具，都会被新标准在执行层消解。

因此，干预的逻辑必须前置一步——不是在系统内部直接修复认知基础设施功能，而是先重建系统对“退化”本身的感知能力。具体的制度设计必须在三个层面同步推进，这三个层面相互咬合但各自独立，任何一个层面的单独推进都会被另外两个层面未改变的条件所抵消。

第一层面是在职业社会化的入口建立感知习惯。法学院阶段的“对手回应训练”不是教学生怎么写回应对手段落的格式，而是在学生进入系统之前，用身体性练习——真判决书精读以训练“听”的能力、批改重写到对手认为被认真对待以训练“回应”的能力、跨时段对比阅读以训练“看衰退”的能力——在他体内建立起一种对“薄”的内部不适感。经过这种训练的新裁决者入行后，在面对系统推力让他写薄时，他的身体会有一个不舒服——不是他说得出哪条法理被违反了，而是他见过好的长什么样子，他没办法假装没见过。这个“假装不了”，就是他者性视角在个体体内存活的具体形态。

第二层面是在日常技术工具中强制植入他者性视角的触发开关。类案系统的边界区分栏位——在每次结案前强制裁决者读取至少三个与自己正在做出的判断在结果方向上相反、但争议焦点相邻的案例，并写入区分性论证——是以技术强制力在一个已经完成“默认值接管”的职业习惯中，人为塞进一个他者性视角的触发条件。它的制度配套只有一个关键点：该栏位内容不纳入改判或发回的依据。如果这个保护条款不生效，裁决者

很快会学会在栏位中写入“经查阅，本案与上述案例案情不同”这句安全套话，技术强制力将被安全写作用一句话就消解。

第三层面是在职业晋升的关口设置不可绕过的深度判决书写作门槛——入额考核中，闭卷限时完成一份不依赖模板的判决书写作，并由资深裁决者从对手回应充分度、区分性论证质量、道义承担的可识别性等维度进行盲审评分，四年内两次未通过者不得入额。这个环节的用意不是筛选“写得最好的”，而是确保任何一个将来成为带教者、成为庭长、成为审委会成员的人，至少在他的职业身体里，留下过一次“真正进入对手叙事框架并做出了不可撤销的判断承担”的身体记忆。这个记忆会在日后他面对大量“只需要快速调解就可以结案”的案件时，在某些时刻让他产生一种内部的迟疑——这种迟疑，就是他者性视角制度化的最基层载体。

这三层设计——法学院的身体记忆、类案系统的技术触发、入额考核的硬性门槛——共同构成了一个在效率逻辑持续施压的制度条件下可局部存活的他者性视角维持系统。它不是替代既有制度的整体转型——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而是在转型短期内不可能发生的前提下，为正在不可逆地丧失的东西守住一个最低限度的存活条件。这个存活条件不能保证系统“变好”，只能保证在系统内部，还有一小部分人会因为早年曾被逼着真正进入过对手的叙事框架，而在某些无法被指标化的时刻，“听”到了什么。

6 结论

6.1 核心发现

本文通过制度功能结构解剖、判决书文本演化分析与代际传承机制诊断，揭示了一个被既有研究系统性遮蔽的结构性问题：效率逻辑对司法系统的侵蚀，最深的一刀不是砍在判决书的厚度上，也不是砍在裁决者的工作强度上，而是砍在法律系统用来“感知他者”的制度条件上。当前中国司法系统面临的核心危机，不是判决书质量下降、裁决者能力不足或案多人少矛盾加剧中的任何一项——这些是危机的症状——危机的根在判决制度作为认知基础设施的代际传承功能正在被效率考核体系系统性地压薄。当在“补写”与调解型管理环境中完成社会化的这代裁决者成为系统主体，他们内心关于“什么是好判决书”的标准已经从论证厚度、区分难度、道义承担位移到程序合规、证据充分、结论正确。一旦发生这种代际位移，任何试图恢复论证深度的改革努力，都将在执行层被新的内心标准消解。终局不是系统崩溃，而是系统在高效运转中失去感知自身退化方向的器官——高效地处置纠纷，不再处理纠纷。

本文对“法律的生命在于逻辑还是在于经验”这一经典追问给出了一个新回答：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也不在经验，而在于它能否在效率逻辑与传统法理自我描述互相加固的压力下，持续维持一种他者性视角的制度化条件。逻辑（规范适用的完备性）和经验（裁决者的实践智慧）都是法律系统运转的必要操作方式，但二者共享一个未经审查的前提——法律的生命力存在于它自身的运转方式之内。本文的诊断表明，当效率治理持续压薄法律系统“感知”他者冲突的条件，法律可以在逻辑操作和经验操作层面都保持运转，却在实质上失去终结社会冲突的能力——它在高速运转，但它的生命感知器官在坏死。

6.2 理论贡献

本文在三个层面做出了理论贡献。第一，在法律本体论层面，本文改写了传统法理学关于“法律是什么”的核心预设。法律实证主义将法律定义为规范的适用体系，法律的自我叙事是“裁决者是对规范进行操作的主体”。本文的诊断揭示了这一叙事在概念上为效率逻辑的深层渗透预留了合法通道——“感知他者”不在这套叙事承认的法律核心职能之内，因此当效率逻辑持续压薄感知条件时，用来诊断“丢失了什么”的概念工具本身就不包含“感知”这个度量单位。本文提出的“他者性视角”概念，为法理学传统增加了一个目前缺席但结构上必要的新维度：法律的核心职能不是在规范体系内部完成逻辑闭合，而是在每一个具体纠纷中，维持一种超越同一性闭合的感知能力——去听到那些不被现有分类格所容纳的声音。

第二，在司法制度研究领域，本文对判决制度功能的既有理解进行了结构性修正。既有文献将判决制度作为单一功能体看待，核心关注在“决断功能”的质量（判决是否正确、是否及时）。本文揭示了判决制度同时承担着认知基础设施功能——判决书是论证资源代际累积的介质、判断能力职业社会化的载体、共同体共享认

知框架的沉淀层——并诊断了这一功能正在被效率治理逻辑系统性压薄的结构性事实。“案多人少”“指标异化”等既有批评，经本文诊断后被整合进一个更根本的判断：它们不仅是当下的制度问题，更是代际退化机制的驱动源。

第三，在研究方法论层面，本文将概念分析与经验检验对接，给出了可供后续实证研究直接采用的分析工具——判决书文本的七个可编码特征在文本层面操作化了合法性话语转换的可检验指标；以“对手回应充分度”为分离变量、以“五年内申诉率”为可观测代理的判别格设计，为“他者性视角作为法律生命力独立变量”这一核心命题提供了可被反驳、可被跨案件类型验证的检验框架。

6.3 实践与政策含义

本文在实践层面的核心主张是：当前司法改革凡是在“优化指标”的框架内所做的努力——如在质效考核体系中增加“论证质量”指标——都有被同一性视角的操作系统收编并指标化、进而被表面合规化的风险。一个系统在“好判决书”的标准已经从内部被位移之后，指标优化只会激励裁决者更快地学习“如何在形式上满足新指标”，而不会重启对实质论证的追求。因此，本文的干预建议不是修改某一项考核指标，而是在效率考核体系之旁、而非之内，建立一套独立于效率逻辑的他者性视角维持系统。具体的制度设计建议已在5.5节中展开，“对手回应训练”从法学院阶段的身体感知习惯入手；类案系统的边界区分栏位在日常技术工具中强制植入他者性视角的触发开关；入额考核的判决书写作盲审门槛在职业晋升的关口设置不可绕过的深度论证硬性要求。三者朝着同一方向用力——在效率逻辑持续施压的制度条件下，为正在不可逆地丧失的感知能力守住一个最低限度的存活条件。

6.4 研究局限

本文存在三重局限。第一，概念推演所依赖的中国司法系统的制度素材，主要来自既有研究者的实证发现和本文作者对公开信息的综合，未经独立的一手田野调查验证。这意味本文对“效率考核如何在日常微观互动中逐案影响裁决者写作行为”的描述，精度限于现有文献提供的经验基础。第二，本文给出的七个可编码文本特征的变化趋势判断，来自对裁判文书网判决书的定性阅读印象，而非系统性的定量编码。本文在6.5节将这些判断转化为可检验的实证预测，正是为了将目前以诊断性判断形态存在的主张尽快推入可被经验验证的轨道。第三，本文的核心分析框架以中国内地司法系统为经验基底，尚未进行跨法系比较的适用性验证。大陆法系的判决书论证传统与中国存在同构性，但普通法系的判例制度赋予判决书以正式法源地位，认知基础设施功能的衰落在判例法系中是否以同样机制和速度发生，是本文的分析框架在上升为一般性理论之前必须被跨法系检验的关键问题。

6.5 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的方法论设计旨在打开一个可在此后五到十年内生长出多个独立分支的研究纲领。以下是可被独立研究者立即承接的五条分支路径：

分支一：判决书文本感知退化的时间序列研究。对裁判文书网1990至2025年间的判决书进行以本文七个编码特征为量表的系统分层抽样，建立判决书论证结构的时间序列数据库。核心问题是七个指标的下降在不同案件类型（民事、行政、刑事）之间是否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差异，以及下降的拐点是否与特定省区质效考核体系的调整时间点同步。独立编码员按编码手册标注后计算评分者间信度，信度达标后用于大规模样本编码。

分支二：代际裁决者内心标准的语义网络分析。在六至八个代表性地级市范围内，对入行十年内的新生代裁决者与入行二十年以上的资深裁决者，各进行不少于五十人的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核心追问是一道开放式题干——“请你描述一份让你印象深刻的好判决书。不必援引法条，只要告诉我在你的记忆里，那份判决书是什么样子。”对访谈文本做语义网络分析，比较两组裁决者在核心概念簇上的系统性差异。如果新生代裁决者的语义网络显著地向“程序合规、证据充分、结论正确”的单一概念簇收缩，而资深裁决者的语义网络仍然包含“论证厚度、区分难度、道义承担”等多元概念簇，则本文关于代际内心标准位移的核心判断将获得一手微观证据的支持。

分支三：类案系统边界区分栏位的准实验研究。 选择一个已启动类案系统区分栏位技术测试的中级法院辖区与一个案件结构和数量相似但尚未上线的对照辖区，上线前与上线后各追踪两年，比较两个辖区基层法院在指定类型边界案件上判决书的论证深度差异。论证深度采用本文七个编码特征中的区分标识词使用度与对手回应匹配度这两个最敏感的指标进行测量。此分支可为“技术工具的强制力是否能在现有制度条件下部分逆转判决书论证厚度的滑坡”提供因果推断。

分支四：法学院对手回应训练效果的纵向追踪实验。 选取两所生源质量接近的法学院，一所引入本文设计的“对手回应训练”法学写作课（精读找漏洞→批改重写改到对手认→跨时段对比阅读），另一所维持常规法律文书写作教学。追踪两院毕业生入职法院后三年内撰写的判决书的论证深度差异及衰减速率，检验在法学院阶段建立的他者性视角的身体记忆，在效率考核体系持续施压的职业环境中能维持多久的显著性。

分支五：实证主义与他者性视角论的判别格跨案件类型验证。 在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争议、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司法审查、传统知识保护的著作权边界争议、算法决策的司法审查标准这四类具有内在价值冲突属性的边界案件中，按本文设计的2×2判别格（规范援引完整性×对手回应充分度）从裁判文书网分层抽样，各格不少于六十份判决。判据是判决作出后五年内申诉率。核心问题是“对手回应充分度”对判决终局效力的独立解释力在不同案件类型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果解释力在四种案件类型中一致偏高，则他者性视角是跨案件类型的普遍性法律生命力变量；反之，则需要精确给出它在什么类型案件中具有决定性、在什么类型案件中只是锦上添花的加分项。此分支将把本文的核心申索从哲学诊断推进为一条可被裁决的经验命题。

这五个分支各自独立但结构上互相咬合——分支一提供宏观的时间序列描述，分支二提供代际差异的微观语义证据，分支三提供技术工具干预的因果推断，分支四提供教育干预的纵向效果评估，分支五提供核心命题的跨案件类型边界定位。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以“他者性视角的制度化条件”为核心问题群、以跨年度文本分析—代际语义网络分析—准实验—纵向追踪—判别格验证为五方法簇的完整科研纲领。这个纲领的工程价值在于，它的每一分支都不依赖另外四个分支的结果——任何独立研究者可以选取其中任何一个分支启动研究，产出一篇独立的、有发表价值的学术论文——但分支之间的核心问题群共享和编码工具互用，让各分支的结果能在纲领内部形成交叉验证。法律的生命力在哪里——本文的核心判断已经给出。这个纲领要做的，是把这判断拆成可被逐一敲碎检验的若干砖，然后一块一块地去敲——有些砖敲不碎，留下；有些砖碎了，换掉。只有经得起反复敲而留下的那些，才配叫骨。